

擬聲政治：論戰後初期 《新臺灣》雜誌的女性修辭

羅詩雲

致理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案助理教授

提 要

在熟知的歷史敘事中，1945年是自由世界戰勝軍國主義的時點，對臺灣而言則是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後，境內的多元住民速求「國民化」(nationalization)的歷史階段；然而國民統合的過程在戰後初期即遭挫敗。加諸國家、國族認同建構的過程中向來指涉了明確的性別關係，本文結合此一殊異的歷史背景及認同建構概念為出發點，由雜誌《新臺灣》國族主義的男性話語空間中的女性修辭，探求戰後初期旅居北京的臺灣知識分子的文化論述與家國想像。首先，整理1946年創刊於北京的《新臺灣》雜誌之緣起與內容議題，詮釋戰後初期臺人言論刊物蜂起的歷史脈絡；再者，由《新臺灣》的性別比喻與女聲敘事的相關文本，剖析日治時期即置身中國的前殖民地臺灣知識分子，對於原鄉中國與故鄉臺灣的發言姿態及身分思考。本文透過《新臺灣》文學文本與報導論述中的女性修辭，意求呈現戰後初期臺人雙重邊緣角度下身分認同與性別話語的政治操作，擬女聲的情感性敘事正表現了臺灣人邊緣他者的自覺性，以及主體性追求的強烈企盼。

關鍵詞：戰後初期 《新臺灣》 女性修辭 家國想像 藍明谷

擬聲政治：論戰後初期 《新臺灣》雜誌的女性修辭

羅詩雲

致理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案助理教授

一、前言

在熟知的歷史敘事中，1945年是一個自由世界戰勝軍國主義的時點。臺灣戰後復歸中國經由開羅會議得到英美承認，開啓了臺灣人對於民主價值的追求與身分正名的行動。這時期亦是臺灣脫離帝國主義殖民統治後，於短時間內將居住於境內的多元住民「國民化」（nationalization）的關鍵階段。但是這國民統合的過程並未替戰後初期的臺灣知識分子帶來光明的前景，反而令其遭遇嚴重的政治挫敗與認同分裂，故此間臺人的心路歷程實值得進一步深究；敘事話語本身即為一種建構性的文本操作，映現了作者與所生存社會之間的對話。由此角度析論旅居北京的臺灣知識分子在戰後的書寫策略，亦得以呈示戰後初期置身第一歷史現場的臺人家國想像。加諸國族認同建構的過程向來指涉了明確的性別關係，^①性別對國族建構亦有關鍵性的影響。^②承此，本文將以1945至1946年此一時段為考察範

① 王雅玄、蔣淑如：〈書寫歷史——教科書中性別化國族主義的批判分析〉，《教科書研究》第10卷第1期（2017年4月），頁105-106。王、蔣論文同時提醒讀者國族認同問題的研究常以族群做為認同基礎，而忽略性別與國族、族群之間所產生的可能連結與交互作用，致使國族研究經常存有性別偏差的狀況。本文由此問題意識發想，意欲探究國族主義的男性話語空間中關於性別敘事之操作。

② 「性別」在國族的生物性繁衍、文化的維繫傳遞、公民身分建構等方面皆具關鍵影響。參見楊

疇，由 1946 年創刊於北京的臺人雜誌《新臺灣》為出發場域，細究其現身／現聲文本敘事當中的女性身影，檢視性別與國族敘事之間相互作用的性別形象與主體建構。

關於戰後初期臺灣文化的研究考察已有一定累積，^③專對臺人在中國發行出版刊物的內容討論，大多歸屬在討論戰後臺灣文化重建的脈絡中；與戰後出版刊物相關的旅中臺人之前行研究，分以活動實踐、知識社群、旅居地域為脈絡開展：活動實踐以二〇年代以降臺灣學生運動與戰時重慶國民政府的臺人活動為兩大研究區塊；知識社群方面，臺灣新、舊文人的中國書寫各有成果累積，呈現特定作家的集中討論；旅居地域屬臺人的上海、北京書寫較具系統性。當中與本文直接相關之研究，活動實踐方面包括研討旅居北京之臺人活動的〈1937 年至 1947 年在北京的臺灣人〉、《日治時期臺灣籍民在海外活動之研究（1895-1945）》；^④知識社群方面為中日戰爭期間旅京臺人文化活動、書寫研究，例如鍾理和、張我軍、張深切、洪炎秋等人。此類研究多以國族認同、殖民現代性、文化抗日的論點剖

婉瑩：〈民族主義的父系家／族譜的繁衍與衰落——台灣個案的經驗〉，《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 21 卷第 2 期（2009 年 6 月），頁 297-298。（DOI：10.6350/JSSP.200906.0291）

^③ 「戰後初期」指的是 1945 年 10 月 25 日國民政府正式接收臺灣，至 1949 年底國府國共內戰戰敗撤退至臺灣為止的期間。以行政組織劃分，1945 至 1947 年為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時期，1947 至 1949 年為臺灣省政府時期。參見黃英哲：《「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台灣文化重建（1945-1947）》（臺北：麥田出版社，2007 年），頁 16-17；戰後初期臺灣文化研究既有成果，可分為知識分子的社會及文學活動、文化場域形成及文學思潮、戰後初期文學的文學史意義和個別小說研究、以長官公署文化機構為中心，探討戰後初期臺灣文化重建問題。參見崔木順：〈「重建台灣、建設新中國」之路：戰後初期刊物中「文化」和「交流」的意義〉，《臺灣文學研究學報》第 21 期（2015 年 10 月），頁 44。

^④ 許雪姬：〈1937 年至 1947 年在北京的臺灣人〉，《長庚人文社會學報》第 1 卷第 1 期（2008 年 4 月），頁 33-84。（DOI：10.30114/CGJHSS.200804.0003）此論文利用日本外交史料館所藏臺灣人資料、日本政府對旅外日人（包括臺灣、朝鮮）的逐年統計資料，參考具北京經驗的臺人日記、小說、雜文及口述歷史，屬於歷史背景的資料整理和分析；卞鳳奎：《日治時期臺灣籍民在海外活動之研究（1895-1945）》（臺北：樂學書局，2006 年 7 月）結合歷史學與社會科學理論的研究方法，由臺灣總督府的南進政策，考察滿洲、北京、上海、華南、東南亞地區的臺人活動。此類日治時期臺人活動研究對臺灣知識分子中國經驗的視角，性質為基礎史料和歷史背景的佐證。

析，而能整合北京經驗至戰後初期之論述者，屬鍾理和研究最具體系，研究角度以認同研究為大宗；⁵旅居地域與知識社群研究對象多有疊合，當中專就北京一地論述臺人書寫者，唯學位論文《淪陷時期旅平臺籍文化人的文化活動與身分表述》。然此論缺乏作家赴京前在臺灣或中國其他地域活動的爬梳，故對戰時文化態度的抉擇或作家思想的轉變缺乏脈絡式詮釋；旅京臺灣作家群的深論，可見張泉關於戰時北京文壇著述。⁶其他著述散見江文也、劉捷、楊英風等具北京經驗的個案研究，討論時段因臺人移居情況相對集中於戰時。⁷

從上可知，日治時期旅中臺人與戰後初期臺灣文壇之前行研究頗具史料背景的基礎研討，尤其臺灣知識分子在中國的政治運動已獲相當整理；然而臺人中國

-
- ⁵ 鍾理和中國旅居書寫的研究集中於北京時期的《夾竹桃》，以及1946年前後返臺經驗的文本。以身分認同為主要問題意識者，如張良澤：〈鍾理和作品中的日本經驗與祖國經驗〉，《中外文學》第2卷第11期（1974年4月），頁33-57（DOI：10.6637/CWLQ.1974.2(11).32-57）；宋冬陽：〈朝向許願中的黎明——試論吳濁流作品中的「中國經驗」〉，《文學界》第10期（1984年5月），頁127-146；張惠珍：〈紀實與虛構：吳濁流、鍾理和的中國之旅與原鄉認同〉，《臺北大學中文學報》第3期（2007年9月），頁29-66（DOI：10.29766/JCLLNTU.200709.0002）；黃麗月：〈「中國作家」／「臺灣作家」：夢的兩端——解讀鍾理和返臺前後的作品〉，《漢學研究集刊》第4期（2007年6月），頁111-138。（DOI：10.7045/YJCS.200706.0111）
- ⁶ 王申：《淪陷時期旅平臺籍文化人的文化活動與身分表述》（北京：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博士論文，2010年）。此博論以戰時旅京臺灣作家群體為考察，定位張深切、張我軍、洪炎秋、鍾理和的北京活動為文化報國、奉公異聲、隱逸之姿、鄉土書寫四種類型；張泉長期耕耘中日戰爭時期為日本勢力範圍的中國文學史論，尤其是華北殖民體制和北京區域文學生態，旅京臺人便在此框架下成為戰時北京文壇的作家群像一隅。相關著作有：張泉：《淪陷時期北京文學八年》（北京：中國和平出版社，1994年）；張泉：〈張深切移居北京的背景及其「文化救國」實踐——抗戰時期居京臺籍文化人研究之一〉，《臺灣研究集刊》第92期（2006年6月），頁80-88；張泉：〈北京淪陷期的臺灣文人群落：以共時的殖民體制差異和歷史的殖民演化型態為切入點〉，《跨國的殖民記憶與冷戰經驗：臺灣文學的比較文學研究》（新竹：國立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2011年），頁331-362。〈北京淪陷期的臺灣文人群落〉此文具體探討張深切《中國文藝》排斥政治宣傳的文化救國理念，與鍾理和《夾竹桃》面對政治文化、區域分割關係的身分表明困境，點明臺灣人戰時文學表現於日本帝國共時的殖民體制差異。
- ⁷ 日治時期臺人旅居北京狀況於1938年後人數逐漸增加，四〇年代北京已是華北地區臺人居留人口最多的地方。參見許雪姬：〈1937年至1947年在北京的臺灣人〉，頁43-46。

經驗書寫的研究，在時間、空間、研究視角的設定則相對顯得片段、分割，鮮有貫串日治與戰後前後脈絡的通盤性考察；⁸本文考察《新臺灣》雜誌的意義在於其發起人、出版者、執筆者身分是以旅京臺人為核心成員，且此刊 1946 年即在中國出版發行，頗具影響力。從此刊物的成立背景、組織成員、篇章屬性，可知《新臺灣》不啻為戰後旅京臺灣人的言論代表機關，茲以提供研究者觀察戰後在中國的臺灣知識分子之思考脈絡。論述步驟上，首先整理 1946 年創刊於北京的《新臺灣》雜誌之背景緣起與內容議題，定位戰後初期《新臺灣》的文化意義；再者，就《新臺灣》所屬組織臺灣省旅平同鄉會之委員與已知作家概為男性的狀況下，由雜誌的性別比喻與女聲敘事的相關文本，剖析日治時期即置身中國的殖民地臺灣知識分子，戰後對於原鄉中國與故鄉臺灣的發言姿態及身分思考。所謂政治，意指一群人支配另一群人的權力結構關係，而性別是國族建構過程中不可迴避的層面。本文透過《新臺灣》女性修辭當中的「性別比喻」和「女聲敘事」兩個層面，呈現戰後初期臺人雙重邊緣角度下身分認同與性別話語的政治操作。⁹擬女聲的情感性敘事正表現了臺灣人對邊緣他者的自覺性，以及主體性追求的強烈企盼。

二、臺灣省旅平同鄉會與《新臺灣》¹⁰

日治時期旅京臺人團體概況，可由臺灣知識分子文化組織、同鄉會及其會館

-
- ⁸ 旅京文人個案研究當中，沈信宏的碩論破除了地域、時間之於臺人作家生命經驗的切割。論文專就洪炎秋日治到戰後在臺灣、日本與中國的文化活動進行考察，藉由臺灣知識分子的流動經歷與認同轉折，貫串戰前、戰後世代的文學經驗與臺灣、中國場域的五四傳統。參見沈信宏：《洪炎秋的東亞流動與文化軌跡》（臺北：秀威資訊，2016 年）。
- ⁹ 「修辭」是組織言辭或文句效果的藝術手法，定義參見吳禮權：《中國現代修辭學通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8 年），頁 72。本文所謂「女性修辭」（female rhetoric）之定義，就《新臺灣》雜誌而言主要包括「性別比喻」和「女聲敘事」兩種敘事層次。
- ¹⁰ 北伐後的中國以南京為首都，北京改名為北平特別市。1937 年中日戰後，北平被日軍佔領，改名為北京。1945 年中日戰爭結束，同年恢復原名北平。1949 年 1 月，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入北平市，宣告「北平和平解放」，同年 9 月北平市改稱北京市。本文統一使用「北京」指稱此地。

分述，而《新臺灣》的創刊團體為「臺灣省旅平同鄉會」。同鄉會組織以地緣為中心，建立在移居者本籍地緣之基礎，並以移居地為會址所在地。北京的臺人同鄉會沿革，據現有史料確知清代已有臺人同鄉會組織，但是管理鬆散，臺人多參與閩籍會館的同鄉會組織。同鄉會以會館作為活動會所，供在京鄉人聚會及來京鄉人暫住之用。臺人同鄉會直至 1937 年後方收回北京大江胡同的臺灣會館自管，自此臺灣會館正式成為同鄉會附屬財產；¹¹北京臺人會館與相關使用狀況，由於臺人身分敏感與臺灣會館產權不明，民國時期北京閩籍會館不時有臺人身影，已知二〇年代部份留學北京的臺灣人選擇入住後孫公園附近的泉郡會館，例如張我軍、張鍾鈴、洪炎秋等人。戰時北京期間臺灣會館產權已由旅京臺人收回，即有臺人入住大蔣家胡同的臺灣會館之紀錄，例如 1941 年赴北京發展的鍾理和。1945 年後臺灣會館更成為旅平臺灣同鄉會與旅京臺人組織的活動據點。¹²

由北京臺灣同鄉會的記錄，可知 1937 年前後謝廉清（1903-1961）、林煥文（1888-1931）、林少英（1878-1956）、張深切（1904-1965）、洪炎秋（1899-1980）、梁永祿（1910-1951）等人陸續出任同鄉會會長，¹³梁永祿的三安醫院為當時華北返鄉臺人的戰後暫住地。戰時北京臺人文化活動雖活躍，相對的臺人同鄉會因戰時體制與臺籍身分之故活動並不積極，張深切描述：

北京本有一個臺灣同鄉會，旅京同鄉都不喜歡參加，因為這裏的同鄉，大抵冒稱福建人或廣東人，自食其力，以託庇日本勢力占便宜為恥辱，這在全國可謂絕無僅有的特徵，日本當局認為這是要不得的嚴重問題，想要加強同鄉會，利用同鄉會做他們的御用機構。

這一年動員領事館全體人員勸說臺灣籍民必須出席同鄉會參加重要會議，改選幹部。我被迫不得不去參加，詎料同鄉們竟推舉我為負責人……。¹⁴

¹¹ 北京市臺灣同胞聯誼會編：《臺灣會館與同鄉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年），頁 122-123。

¹² 同前註，頁 92。

¹³ 同前註，頁 132-133。

¹⁴ 陳芳明等編：《張深切全集 2 里程碑》（臺北：文經出版社，1998 年），頁 657。

文中 1939 年臺灣同鄉會會議只是進行人事改選，表示在這之前臺灣同鄉會已經存在。1943 年 5 月張深切日記另載臺灣同鄉會第四次總會記事，會員總數達七十名，¹⁵此間未有明顯的活動跡象。直到 1945 年中日戰爭的結束，北京臺灣同鄉會的組織活動方告積極。

1939 年張深切迫於情勢曾出任了北京臺灣同鄉會會長，雖然中間曾回臺兩次，從其 1941 年北京活動期間研判，仍持續同鄉會的服務至 1945 年臺灣省旅平同鄉會的成立。¹⁶ 1945 年中國戰勝之際，張深切便積極協調旅京臺人返鄉事宜。北京臺人同鄉會組織於戰後積極投入相關建設，陸續成立臺灣省旅平同鄉會（1945.9）、臺灣革新同志會（1945.10）、臺灣省旅平同學會（1946.4）等團體。本文討論對象「臺灣省旅平同鄉會」的機關誌《新臺灣》，詳載了臺人活動之熱切與組織性：

旅平台灣人士因此次我國抗戰勝利，得以脫離日人羈絆，無不歡欣雀躍，已於日前致電 蔣主席致敬，並於九月九日下午二時在西單大光明戲院開全體大會，出席者共有五百多名，討論百出，情緒熱烈，其盛況洵謂近年來未有見之……。¹⁷

距離 8 月 15 日日本宣佈投降不及一個月，「臺灣省旅平同鄉會」旋即召開極具規模的成立大會。選出執行委員七名，即梁永祿、洪炎秋、林朝榮、張我軍、張深

¹⁵ 陳芳明等編：《張深切全集卷 11 北京日記·書信·雜錄》（臺北：文經出版社，1998 年），頁 345。

¹⁶ 陳芳明等編：《張深切全集 2 里程碑》，頁 731：「民國三十二年至三十四年之間，我灌注全付精神為同鄉會服務，並認真學習做生意，……這時日本當局很想利用在北京的臺灣人，派往前線服務。他們看中北京的臺灣人都會講『官話』，利用做翻譯官或宣撫員最適當。我以同鄉會長身分極力反對，強調他們現在的職位，都比在前線工作更重要，……拼命和他們周旋，推翻了他們的徵用計畫。」

¹⁷ 編輯部：〈台灣省旅平同鄉會成立〉，《臺灣舊雜誌覆刻系列 4《新臺灣》》（臺北：傳文文化，1998 年），頁 8。原出處為《新臺灣》創刊號（1946 年 2 月 15 日）。本文所引用《新臺灣》雜誌內容，皆出於此覆刻系列。

切、吳敦禮、洪耀勳；監察委員二名，即陳天錫、蘇子衡，委員均為戰時旅居北京的臺灣知識分子。¹⁸同月舉行第一次執行委員會會議，議決委員職務：會長洪炎秋、事務委員洪耀勳、文書委員張我軍、聯絡委員張深切、調查委員吳敦禮、學務委員林朝榮、宣傳委員梁永祿，同鄉會辦事處設立在西城南太常寺4號。¹⁹簡章第一章總則第二條「本會以圖謀會員親睦及增進旅平臺灣同鄉之福祉為目的」，為達同鄉會組織目的而進行管理臺灣會館、斡旋同鄉職業、發行會報介紹本省實情、救濟同鄉、輔導同鄉留學生、設置宿舍及有益娛樂機關、舉行懇談會等事務。²⁰由協助中國政府接收臺灣、供政府瞭解臺灣現況與協助華北臺人返鄉等活動，加之其組織性、人事決定，都顯現臺灣省旅平同鄉會之規模與聯絡網之緊密，頗具北京當地的社會影響力。

臺灣省旅平同鄉會進一步與天津市臺灣同鄉會（會長吳三連）併為臺灣省平津同鄉會聯合會，加強會務進行，主要工作為維護臺人權益、支援臺灣國語運動、協調安排華北臺人回鄉事宜。²¹從團體發展狀況看來，臺人戰後在北京的團體組織一時林立，但能持續運作且發揮影響力者，屬臺灣省旅平同鄉會與其後的臺灣省平津同鄉會聯合會二者。「臺灣省旅平同鄉會」的機關刊物《新臺灣》，創刊於1946年2月15日，迄同年5月1日為止共發行四期，由新臺灣社出版，宣傳委員梁永祿擔任發行人兼編輯，第二期起曹哲隱為主編。²²對照日後國民政府接收臺灣

¹⁸ 《新臺灣》雜誌介紹，參見秦賢次：〈《新臺灣》導言〉，《臺灣舊雜誌覆刻系列4《新臺灣》》，頁5-7。

¹⁹ 同前註，頁6。

²⁰ 北京市臺灣同胞聯誼會編：《臺灣會館與同鄉會》，頁143-144。

²¹ 秦賢次：〈《新臺灣》導言〉，頁6。編輯部：〈台灣省旅平同鄉會成立〉，頁8。臺灣省平津同鄉會聯合會運作下，成立了五個社團：第一為臺灣革命同難同志會；二為臺灣省教育協進會，協力政府改進臺灣教育；三為臺灣革新同志會，會長為林少英；四為新臺灣建設協進會；五為臺灣省旅平醫師聯絡會。組織的共同目標「希望糾合同志，各盡所能，以協助政府，把臺灣建設成一個全國的模範省」。北京市臺灣同胞聯誼會編：《臺灣會館與同鄉會》，頁147。然獲得政府許可正式運作者唯臺灣革新同志會（1945年10月14日成立），會務主要是協助文教人員訓練、赴臺從事國語語文教育，張深切、洪炎秋、林少英都是該會同仁。

²² 《新臺灣》停刊原因唯見秦賢次〈《新臺灣》導言〉一文說明，或因第四期難音〈台灣行政恐無救藥之危機〉抨擊行政長官公署而被當局停刊。參見秦賢次：〈《新臺灣》導言〉，頁9；

呈現的腐敗、混亂與二二八事件，1945 至 1947 年此間呈現相對平穩的狀態。²³《新臺灣》的創刊意義在於戰後初期社會狀態相對平和、言論活動相對活躍的建設時期，為旅居中國的臺灣人言論代表機關，且能呈現 1945 至 1947 年間臺灣人的新中國想像；²⁴戰時旅居上海的楊肇嘉認為戰後中國政府對臺灣人的三項失察，亦可勘查出《新臺灣》創刊原因：

一是將居住於大陸淪陷區的臺灣人和朝鮮人一樣視同「敵僑」待遇。二是將臺灣暫劃為「特區」，設行政長官公署而不設省。三是臺灣人原都是大漢民族的後裔，……政府遲遲不公佈恢復這些人的中國國民的國籍。最感焦急的當然是那批居住於淪陷區的臺灣人。²⁵

引文第一項指的是 1945 年 11 月國民政府核定的「關於朝鮮及臺灣人產業處理辦法」；第二項是 1945 年 9 月 1 日成立負責接收並直接統治臺灣的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第三項為 1946 年 1 月 12 日始公佈臺灣人國籍恢復為中華民國籍的行政命令；除此之外，國民政府更以漢奸嫌疑罪名逮捕部份旅京臺人，如江文也、柯政和、謝廉清、彭華英、林文龍等人。²⁶戰後臺灣人並未相應得到身為中華民國國民

另外從《新臺灣》出版項說明也可側面推敲發行狀況，觀察第一至三期出版項皆載有「本雜誌待交通回復後擬移至台北發行」字樣，停刊前第四期聲明「本社隨時機的演變，將來或有再移至國內之可能性」，出版項欄位已見新臺灣社社址為臺灣省臺北市（詳細地址未定），並載有「本雜誌現正籌辦移至台北發行」字樣，且分為駐平辦事處與臺灣聯絡處。前者設於南太常寺四號（亦為臺灣省旅平同鄉會會址），後者則載臺南市中山路一丁目的梁永祿先生、臺北市省立女子師範學校洪楨先生。因此可推測發行機關新臺灣社與《新臺灣》第五期之後發行事務已在臺灣實際運作，卻因故未能發行。

²³ 蘇瑤崇：〈「終戰」到「光復」期間台灣政治與社會變化〉，《國史館學術集刊》第 13 期（2007 年 9 月），頁 47。（DOI：10.7058/BAH.200709.0045）

²⁴ 北京市臺灣同胞聯誼會編：《臺灣會館與同鄉會》，頁 149。此書將臺灣省旅平同鄉會活動分為三階段：1945 年 9 月至 1946 年 5 月，組織臺人建設戰後臺灣；1946 年 5 月至 1947 年底，旅京臺人投身民主運動；1948 年以後的北京。

²⁵ 楊肇嘉：《楊肇嘉回憶錄》（臺北：三民書局，1970 年），頁 350。

²⁶ 秦賢次：〈《新臺灣》導言〉，頁 7。

的權益與平等對待，於是感於政府政策失當的旅京臺灣人開始組織團體，發起《新臺灣》刊物為臺人之喉舌藉以集體發聲，呼籲政府當局重新思考、改正戰後措施。此外，《新臺灣》還有宣揚臺灣人對中國的民族情感與貢獻新中國建設的意義，展現對自我身分的追求與定位。

編輯部將《新臺灣》發展劃分為三階段：祖國及臺灣的交流橋樑、為旅居中國的臺人爭取權利、對中國報導臺灣現狀，喚起國內外言論機關注意。²⁷《新臺灣》雜誌期以言論自由推進中國的臺灣建設，實踐民主的航線。《新臺灣》的約稿簡則註明歡迎有關臺灣的文字、退還無關臺灣之來稿，隨期號的發行簡則逐添歡迎推行臺灣教育、國語文、有關之文藝，以及臺灣政治、經濟、社會問題的稿件。加之預計中臺兩地交通恢復後，刊物擬移至臺北發行的計畫，²⁸顯示《新臺灣》編輯與從屬團體之北京臺灣人對臺灣的關懷與文化、政治上的理想；至於《新臺灣》發行狀況，依據梁永祿所藏《《新臺灣》發送名冊》資料，《新臺灣》每期都會寄予時任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的魏建功、何容各兩本，其他收件人包括連震東、游彌堅、黃朝琴、宋斐如、林獻堂等社會要人，臺北的省外臺胞送還促進會、民報社等單位，以及以平信方式寄送臺灣的讀者，合計有八千多冊。²⁹足見其發行影響力不僅是從屬團體同鄉會與編輯群所在地的北京，更含納了臺灣知識分子、在臺政府官員在內。綜上所述，協助戰後中國社會穩定、建設臺灣、促進中臺兩地文化交流，以及教育與國語運動推進等項目的臺灣省旅平同鄉會，透過《新臺灣》的出刊展現了旅京臺人對中國、臺灣兩方積極爭取言論空間與政治資本的行動。

²⁷ 本社：〈謹對全國愛國志士及言論界諸公呼籲〉，《臺灣舊雜誌覆刻系列4《新臺灣》》，頁1。原出處為《新臺灣》第1卷第4期（1946年5月1日）。

²⁸ 編輯部：〈約稿簡則〉，《臺灣舊雜誌覆刻系列4《新臺灣》》，頁16。原出處為《新臺灣》創刊號（1946年2月15日）。

²⁹ 汪毅夫：〈愛國愛鄉兩岸情——讀梁永祿先生家藏文獻〉，《團結報》第6版，2010年4月1日。

三、代言式書寫：戰後初期《新臺灣》的女性修辭

《新臺灣》是極富政治意識的綜合性雜誌，內容集中闡述戰後臺人處境、國族歷史與身分認同議題。然而性別關係是國族認同建構的運作關鍵，³⁰是故在此充滿國族敘事的話語空間裡，女性修辭的份量雖少，卻是不可忽視的存在。若以發行四期的《新臺灣》篇幅比例加以計算，約佔 22%的藝文創作中近半數使用了女性修辭的相關敘事手法，包括慳生連載的〈一個少女的死〉、藕子〈安靜的死者〉、餘波〈冷齋小記〉等短篇小說，非久的散文〈我的家鄉〉，以及林鷹的古典詩〈弔五妃墓祠〉等。³¹加諸文本發表的戰後初期時空、雜誌發行組織「臺灣省旅平同鄉會」及緊扣身分思辨的文本創作意識，足見其女性修辭運用的特殊意義。以下依據性別比喻與女聲敘事的修辭操作屬性，討論其敘事的女性修辭與其書寫意義：

³⁰ 楊婉瑩：〈民族主義的父系家／族譜的繁衍與衰落——台灣個案的經驗〉，頁 314-315。

³¹ 《新臺灣》以女性作為主要修辭比喻、敘事人物或報導對象、例證的篇章，其種類包括卷頭語、消息報導、時事評述、古典詩、小說、散文等；總刊共七十九篇文章的《新臺灣》，當中藝文創作包括（按刊行時序）：非久（梁永祿）〈我的家鄉〉（（一）（二）（三））、江流（鍾理和）〈白薯的悲哀〉、陳文藝〈一個台灣人的自白〉（共兩回）、慳生（藍明谷）〈一個少女的死〉（共兩回）、孫裕恆〈台灣！我們的台灣！〉、曾慧明、趙子明、秦榮〈為台灣〉、藕子〈安靜的死者〉、林鷹（林少英）〈台灣光復有感〉、林鷹（林子瑾）〈過竹滬弔靖王〉、〈謁延平郡王祠〉、〈弔五妃墓祠〉、慳生（藍明谷）〈問答小天地〉、餘波〈冷齋小記〉等散文、小說、詩歌、古典詩，共十七作，藝文性創作佔雜誌 22%。又十七篇藝文性創作使用女性修辭者為八篇，比例近一半。其餘約佔 78%的非藝文性篇章使用女性修辭者，包括〈創刊詞〉、梁永祿〈請詢問這個女孩子以測知台胞愛國的熱烈〉、伍君〈為台灣人提出一個抗議〉、編輯部〈台灣人產業處理辦法實有難於忍耐之點〉、灘音〈台灣行政恐無救藥之危機〉等卷頭語、消息報導、時事評述三類文章，共五作，比例僅佔 8%。且除〈創刊詞〉外，非藝文性篇章的修辭操作模式與本文所論之藝文性作品顯然不同，餘者皆以女性作為愛國論述的輔助例證，而非第一人稱的女聲敘事或性別比喻。

(一) 「母親中國」的家庭構圖

自我心靈是文化性與社會性的，藉由與他人相互對照認識自己，而這個過程會不斷持續，其呈現與闡述同時深受四周環境所影響。³²故自我對於身分的定義雖屬個人的，但本質亦是社會的，類同與差異之間的互動是認同形塑過程的邏輯。戰後旅京臺人的自我身分問題同樣牽涉外在環境因素，一方面透過集體血緣、歷史記憶與文化意識的類同與中國產生連結，一方面又因前殖民地背景差異而被中國所排斥。這兩者的互動由《新臺灣》創刊詞即可見出：

小弟弟和家隔離五拾一個月，現在已經回到家裏來了。脫出幫票的虎穴，歸到慈母膝下的這個小弟弟是如何愉快和興奮呀！

天天在那些粗漢的壓迫下，走過流浪生活的小弟弟該是聰明的。禮貌，待人，語言等家法用不著父母操心，在很短時間內一定能學會。因為做過人家奴，所以小弟弟的愛家心也許比他的父母還強。……但是只要有一點兒時間和空間，小弟弟願意多說一點話。這對維持家庭的和平和家庭的新建設很有用處。³³

雜誌編輯群以「家」的構圖將戰後臺灣的脫殖民比喻為回家（中國），「小弟弟」等同臺灣，「慈母」指涉中國，「粗漢」則是日本殖民者，「流浪生活」就是臺灣 1895 年以來的被殖民歷史。文中視禮貌、待人、語言為「家法」，即指臺灣回歸中國之後需要的文化背景與語言工具，由於臺灣人強盛的「愛家心」（愛國心）必定可以迅速融入中國的大家庭。「小弟弟願意多說一點話」可想作是旅京臺人回鄉貢獻以及為國出策的規劃，包括各地同鄉會與《新臺灣》的創刊都是此身分

³² 任金斯 (Richard Jenkins) 著，王志弘、許妍飛譯：《社會認同》（臺北：巨流圖書出版，2006 年），頁 72-73。

³³ 編輯部：〈創刊詞〉，《臺灣舊雜誌覆刻系列 4《新臺灣》》，頁 1。原出處為《新臺灣》創刊號（1946 年 2 月 15 日）。

想像之具體實踐。國族是由各種政治修辭所建構而成的文化人工製品，而「家」是人類發展歸屬感和建構主體性的重要元素，具有庇護、安全、愉悅的意義。³⁴

《新臺灣》中「家」的修辭構圖成爲國族想像的參照座標，將家庭擴張至國家政治場域，這不但是臺人展開中國想像的情感位置，也指涉臺灣與中國之間身分認同的血緣文化臍帶。

女性傳統的性別角色是具情感性特質：溫柔的、富同情心的、會照顧人的。³⁵由此來看，女性其實從未缺席國族認同的敘事，透過諸如家鄉、母國、祖國、國族兒女等相關家庭及家的語言譬喻，成爲國族認同建構不可或缺的一部份。³⁶更進一步而論，家庭結構實包括三個基本次系統的交互影響：夫妻關係、親子關係與手足關係。此篇創刊詞亦提到父母、親子、手足，除了前述所論的「慈母中國」援引了撫育的女性特質，別有意味的部份尚有管教小弟弟臺灣的「大哥」：「父母很忙，小弟弟的事總叫大哥去管。其實以其流浪生活的經驗小弟弟還不會管自己嗎？無論大哥怎麼樣無理，為著維持家庭團圓，小弟弟一定聽父母的話」³⁷依原文語意推判「大哥」應指 1945 年 9 月成立的「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長官公署爲了確立國民政府在臺的統治基礎，1945 年 12 月便迅速接收總督府的各級組織與行政工作。其治理態度卻相對排斥臺人在政府與經濟上的參與，社會經濟與政府人事結構遠比日治時期的總督府更爲不均衡，從而產生負面效應與臺人的不滿。³⁸因此創刊詞「無論大哥怎麼樣無理」一句，隱含旅京臺人對臺灣戰後現況的負面評價，但仍對中國政府的治理存有改良的期待。

³⁴ 琳達·麥道威爾 (Linda McDowell) 著，徐苔玲、王志弘譯：《性別、認同與地方：女性主義地理學概說》（臺北：群學出版社，2006 年），頁 98-99、263。

³⁵ 周新富：《家庭教育學——社會學取向》（臺北：五南書局，2006 年），頁 80、93。「性別角色」是對性別所反映出來的行爲期待。也就是指社會、文化根據性別，為其所屬個體所規劃的行爲腳本，即男性、女性應該扮演那些角色，有哪些行爲的規範與期許。

³⁶ 琳達·麥道威爾 (Linda McDowell) 著，徐苔玲、王志弘譯：《性別、認同與地方：女性主義地理學概說》，頁 265。我們也需留意女性與家庭及家的關聯同時呈現社會階層的性別化。

³⁷ 編輯部：〈創刊詞〉，頁 1。

³⁸ 蘇瑤崇：〈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與台灣總督府體制之比較研究〉（臺北：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基金會委託研究，2004 年），頁 24-26。

「家庭」是一種以婚姻、血緣、收養或同居等關係為基礎而形成的共同生活單位，具有情感支持、安全感與經濟提供等功能，意指可以安頓自我的場所，為人類生活中最基本及最重要的一個組織。《新臺灣》的編輯群顯然有目的的使用「家庭」框架，將臺灣收歸於中國的共同生活單位內，並延伸慈母教子的既定印象，既嘗試解套臺灣做為殖民地的不忠原罪，其「慈母」的性別化意象又顯現此時臺人對中國的樂觀期待；換言之，《新臺灣》創刊詞運用了「慈母」形象比喻臺灣認同的依歸——中國，臺灣與中國之間的關係被置放於「家」的想像框架，一方面以具有血緣概念的家庭比喻連結了臺灣與中國，另一方面則以做為小弟弟的臺灣對比身為慈母的中國，寄寓了過往為日本殖民地的臺灣向中國期望獲得諒解的文化心理。子女（臺灣）之於父母（中國）的依附，父母（中國）之於子女（臺灣）的包容，兩者交互作用下投射出中國母親的慈愛必能體諒遭受日本粗漢或日本繼母壓迫的臺灣人之心理狀態。

換個角度視之，《新臺灣》諸篇同時在復歸中國的喜悅之外，也透過國族的性別意象顯露戰後臺人深刻意識到中國方面如何看待自我身分。亟欲解釋身分、強調身分正當性的意識是當時旅居中國的臺灣人之普遍心理與現實問題。戰時旅滬的楊肇嘉就曾回憶華北、華中一帶到上海轉乘返鄉的臺灣人，除了生活救濟、交通運輸工具等問題，身分的證明也是亟待解決的。³⁹

作為《新臺灣》文化論述重點的「認識臺灣」，介紹方式包括單篇散論、個人回憶、中國記者訪臺系列文章與活動參訪整理。系列連載〈我的家鄉〉以臺灣、北京兩地「差異」為主軸，末回以民情風俗和日常生活寫出臺灣民情淳樸、沒有階級差別的美好，而批判中國猶如「母親的奶沒有營養，缺乏維他命」，只是帶來封建的陋習污染。⁴⁰作者梁永祿的文字隨章回愈趨展露強烈的鄉愁情緒，且隱含

³⁹ 楊肇嘉：《楊肇嘉回憶錄》，頁 348。

⁴⁰ 非久（梁永祿）：〈我的家鄉（一）〉，《臺灣舊雜誌覆刻系列 4《新臺灣》》，頁 5。原出處為《新臺灣》第 1 卷第 2 期（1946 年 2 月 28 日）；非久：〈我的家鄉（二）〉，《臺灣舊雜誌覆刻系列 4《新臺灣》》，頁 8。原出處為《新臺灣》第 1 卷第 3 期（1946 年 4 月 1 日）；非久：〈我的家鄉（三）〉，《臺灣舊雜誌覆刻系列 4《新臺灣》》，頁 11。原出處為《新臺灣》第 1 卷第 4 期（1946 年 5 月 1 日）。

臺灣較中國來得現代化的價值判斷，透過臺灣社會秩序、人文風情及生活習慣的良好水準，凸顯北京生活的人為麻煩與不安；回視第一期梁永祿的記者會發言報導〈請詢問這個女孩子以測知台胞愛國的熱烈〉，敘事情緒尤其激動，標題雖以他的女兒為主，但篇幅著重鋪述身為父親的梁永祿對祖國的熱愛：

這個台籍孩子，這七年來始終一貫在中國學校受了初等教育了。她走的道是平坦的，可是她父親所走的是相反的。多少的誘惑，多少的壓迫，多少的反對，多少的批判，他都全克服了。這個力量的來源很簡單。他小的時候就愛中國，因為他知道他是漢民族。他大了更愛中國，因為他在學校受過日本人的壓迫。⁴¹

這篇記者會的發言報導，敘事框架是構築在父親為主的家庭組織，敘事重點並不是女孩本身的不平等遭遇，而是她的父親歷經了多少苦難，才得以帶領一家人遷居中國：「她的父親帶著她的母親連三個孩子，五歲，三歲，一歲到北平來了」，⁴²敘事人稱多以「她的父親」起筆，身為臺籍孩子的女兒或母親附屬於父親而無發聲空間。即便是表達己身的愛國心，女性也是被動的成為男性行動的佐證或被保護者，公領域仍為男性／父親所主控界定。這種以女性為輔證強調愛國氣節的方式，同見於林鷹〈弔五妃墓祠〉一詩，由清軍入臺之際與明寧靖王一同殉節的五位妃子，彰顯國家大義下的烈女氣節及漢文化遺民的姿態。

「身分」本非固定不變的概念，實由「文化情感」與「現實策略」所交織而成的概念。⁴³基於原生血緣、地緣關係的文化連帶，以及戰後時空對自由民主價值的脫殖民化追求，無論是《新臺灣》編輯群、來稿者、中國報刊社說之論述，莫不將臺人時刻置入名為「祖國」的民族主義隱喻中，「祖國」成為旅京臺人精神

⁴¹ 梁永祿：〈請詢問這個女孩子以測知台胞愛國的熱烈〉，《臺灣舊雜誌覆刻系列 4《新臺灣》》，頁 4。原出處為《新臺灣》創刊號（1946 年 2 月 15 日）。

⁴² 同前註，頁 4。

⁴³ 廖咸浩：〈在解構與解體之間徘徊——臺灣現代小說中「中國身分」的轉變〉，《後殖民理論與文化認同》（臺北：麥田出版社，2003 年），頁 194-195。

追懷或情感連結的對象。然細察《新臺灣》的敘事方式，由第一期的創刊詞到最後一期的〈我的家鄉〉，雖仍一貫使用「母親」比喻中國，但是敘事態度已由正面期待轉變至失望落寞的批判情緒。創刊詞中母親與家庭的修辭策略顯示中國被建構成愛、情感、同情的所在，臺灣是再度回歸慈母中國懷抱的撫育幼子。至末期擔任《新臺灣》發行人的梁永祿〈我的家鄉〉一文對母親中國缺乏維他命的批判，則表露旅京臺人對戰後中國的失望。短短三、四個月的時間，旅京臺人已敏銳察覺戰後中國之於臺灣的不信任，而感到落寞、悲憤，這樣的情緒轉變更顯見於小說作品之中，此部分待下一節討論。

（二）島上的棄婦：〈一個少女的死〉、〈安靜的死者〉、〈冷齋小記〉

臺灣歷史上同時接納移民與遺民，前者涉及空間上的轉換，後者則是時間上的裂變。⁴⁴換言之，就日治時期主動移居中國或於中國展開政治實踐的臺灣知識分子而言，其情感結構與書寫或多或少涵蓋了移民與遺民意識，從而影響其書寫關懷與策略。而〈一個少女的死〉、〈安靜的死者〉、〈冷齋小記〉三篇短篇小說的共同之處是女性作為敘事者或主要人物，另或結合病體、死亡、貧困的苦痛情節。男性與女性兩者相互關係是文化運作的機制之一，「女性」之於文本的意義多具自我生活與其思維的情感性、敘事性。而這三篇小說的敘事方式穿插了書信、日記體或大量對話，不論是人物情感表達或是敘事口吻皆顯激昂，人物於瑣碎的情節推展中不斷闡述特定觀點、立場，敘事方式則敏銳感知歷史的推移而記註日期時間，可謂揉雜了女性柔性言談與男性剛性言談的特質。⁴⁵這些故事的內容與訴求，隱含了臺灣人期待以三民主義為號召的中國政府之臺灣治理，以及去殖民化後迫切尋求國家認可的身分正名之想望。

⁴⁴ 王德威：《後遺民寫作》（臺北：麥田出版社，2008年），頁27。

⁴⁵ 黃淑玲、游美惠主編：《性別向度與臺灣社會》（臺北：巨流圖書，2012年），頁40-42。女性柔性言談具有細節描述、自我揭露、軼事情節以營造個人親密感和生活連結之特性；男性剛性言談具有以言談掌握局勢、證明自我、協商利益、壟斷互動以彰顯權威、強調自我看法的特性。

〈一個少女的死〉的作者藍明谷（1919-1951）取《離騷》與屈原愛國情懷之意，以筆名「慳生」於四〇年代北京發表作品。⁴⁶〈一個少女的死〉的創作背景，乃是藍明谷取材自妹妹的真實遭遇：藍明谷的兩個妹妹先後接受臺灣職能奉公運動的特殊看護婦訓練，分別派往香港與海南島服務，結果在海南島的二妹藍票因感染瘧疾而病逝。⁴⁷日治時期的臺灣女性在戰時殖民政府亟需人力的狀況下，除了擔負起勞動生產者的責任外，醫護人員是另一個需要臺灣女性投入的角色。1942年起總督府開始募集、派遣臺灣的看護助手至海外進行看護勤務，這些臺籍女性看護婦都接受過包紮、傳染病知識等短期護理訓練及日本國民精神訓練。⁴⁸在國家權力與戰爭統制之下，殖民地女性也被收編於帝國的軍事動員對象。藍博洲認為此篇描寫了一個殖民地臺灣少女的民族認同覺醒，更透過少女的死亡批判了日本帝國主義所發動的戰爭，以及表現臺灣人對於故都北平的嚮往。⁴⁹

〈一個少女的死〉篇首少女P藉由兄長的來信質疑護理派遣的勤務本質：「我們不該再有錯誤與無謂的犧牲，G 姊，你想對不對？」一改溫柔而被動的態度，少女P 質疑為國服務的派遣信念而產生辭職回鄉的想法，卻受同院醫師阻擋無法如願。當中少女的民族意識顯然是受其兄姊所影響啓蒙，P的胞姊亦來信懺悔當初為何不反抗看護勤務的徵召：「我們到底是為誰服務呢？我不能坦白地告訴你。讓你自己去思慮……。」⁵⁰家人的兩封來信啓發了P 對派遣工作的疑慮，以及對

⁴⁶ 曾健民主編：《復現的星圖》（臺北：人間出版社，2000年），頁63。藍明谷（1919-1951）高雄人，本名藍益遠，1938年臺南師範學校畢業，分發屏東枋寮工學校任教職。1941年赴東京，1942年考取北平東亞（興亞）經濟學院，企圖前往抗戰。1943年離開東亞經濟學院，欲報考北京大學，因經濟考量赴河北新鄉從事記帳。1945年8月回北平，1946年10月返抵臺灣，任職教育會辦事員。1947年加入中共在臺地下黨，1949年回岡山老家展開逃亡生涯，1950年底投案。藍明谷生平參見曾健民主編：〈藍明谷大事年表（一九一九～一九五一）〉，《復現的星圖》，頁45-49。

⁴⁷ 同前註，頁65-66。資料原引述自李河民先生口述資料。

⁴⁸ 吳欣樺：《硝煙與白衣：日治末期的台灣從軍看護婦》（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年），頁34-42。1942年初臺灣總督府正式公開募集、派遣臺灣女性擔任看護助手，經由全島公開招募、考試篩選後，以短期訓練的方式快速培育。

⁴⁹ 曾健民主編：《復現的星圖》，頁66-67。

⁵⁰ 慳生：〈一個少女的死〉，《臺灣舊雜誌覆刻系列4《新臺灣》》，頁15。原出處為《新臺灣》第1卷第2期（1946年2月28日）。引文皆出於同期同頁。

自我身分的思考，在工作、身分雙重問題的夾擊下，精神耗弱的 P 得了 H 島（海南島）風土病喪命。〈一個少女的死〉承襲父系中心的認同建構模式，由哥哥的信啓發了國族政治的思考。且故事呈現雙重權力的結構框架：同鄉前輩 K 大夫之於 G 姐（P 的同學）與女主角 P 的去留決定，以及醫生宰制病人身體的絕對知識權威。前者象徵了國家對女性的徵召統制，後者為醫用關係中身體的規訓，不論何者都是一種控制社會成員的方式。P 作為一個國族與醫療體制中被壓迫的「她者」，生命和身體成為權力角逐的政治空間，她的死亡無疑是戰後四處碰壁的臺灣人命運之映射。

藕子〈安靜的死者〉的敘事匯聚於一名病重的男子（超哥）與其發生婚外情的女子（琴妹）之間，時間地點是黑夜的暗屋內。狹小空間內女子跪在生病男子的床邊交談：「『超哥：我知道你的病已……』這女人抽噎的話語，顫動的聲音，迴轉在屋子裏。」兩人對話雖由女子開啓，然男性不停在過程中指示女子該怎麼做，女子的反應始終夾雜哭泣和淚水。〈安靜的死者〉的「死者」雖指男性，但在人物互動中「他」卻一點都不安靜，話語權仍由男性所掌控，女性被形塑為柔弱的、感性的且屈於男性病體之下的姿態；敘事者另將自然物的月亮比擬為慈母，以烘托兩人生死別離之際的告白氛圍：「月兒掛得很高，投射來的光亮，和緩的，柔靜的，像慈母般的攏絡著屋裏的人及一切……」⁵¹男子最終還是在慈母般的月亮與愛人的守護下逝世。〈安靜的死者〉雖未提及任何國族身分的問題，故事導向與其他藝文作品同屬悲情，被男性拋卻在世間的女子與其非婚生子女之命運，恰應和了此際旅京臺灣人的艱困處境：既無法獲得中國政府的身分承認，又未能獲得安置返臺而被棄於社會的角落。

餘波〈冷齋小記〉由第一人稱口吻，敘述丈夫被以臺奸罪名逮捕審問，妻子無奈等待北京機關判決的故事。身兼具妻子、母親角色的女主角波，於故事中不斷傾訴丈夫被捕後的內心煎熬和家庭負累，更控訴祖國對臺灣人的不公和金錢的罪惡，敘事方式結合呼告與書信體陳述思緒流轉，以女性角度細緻鋪述面對家庭

⁵¹ 藕子：〈安靜的死者〉，《臺灣舊雜誌覆刻系列 4《新臺灣》》，頁 9。原出處為《新臺灣》第 1 卷第 3 期（1946 年 4 月 1 日）。

破碎後的振作歷程。特別的是篇中夾敘的三則書信為上海學生的慰問信、待審中丈夫的平安信、L 先生的鼓勵信，內容分別呈現丈夫為人磊落的印象、堅守真相釐清的丈夫與鼓勵女主角勇敢面對未來的作用。尤其第三封 L 先生的來信直接從女性於社會獨立的生活條件闡述，女主角也由此得到精神啓發直面生活。雖然〈冷齋小記〉仍聚焦於男性所發生的事件情節，卻也點明戰後陷入臺奸政治迫害的女性眷屬議題。進一步細究〈冷齋小記〉的男女主角身分確定為江文也夫妻，由故事細節和記述方式則能推判作者或許是此間在同鄉會工作的江文也妻子吳韻真。⁵²

〈冷齋小記〉扣合《新臺灣》懲治臺奸議題的創刊動機，即 1945 年 10 月國民政府依據懲治漢奸條例展開臺人政治逮捕，交由法院審判的背景。文中插入一段湖北省臺籍漢奸審判無罪之判文，判文主角實指出身臺灣嘉義的莊泗川（1905-2004），⁵³於文末露出一絲公義曙光，並由妻子記憶中削除七月七日的丈夫日記，以及思緒帶出臺灣人久居被殖民境遇的悲痛歷史，以堆疊故事裡臺人丈夫的無辜：

⁵² 依「懲治漢奸條例」在北京遭逮捕的臺籍人士包括：江文也、柯政和、謝廉清、彭華英、林廷輝、林文龍、謝呂西、黃南鵬。參見許雪姬：〈1937 年至 1947 年在北京的臺灣人〉，頁 56-59。依據小說中丈夫的逮捕機關（稽查處）、時間（冬夜）、地點（北京）、家庭成員（1941、1944 年二子分別出生）、性格（淡泊金錢）及身分（藝術家），丈夫應指江文也（1910-1983），1945 年冬被捕後經十個半月方無罪獲釋。江文也妻子為北平女子師範學院音樂系主任修琵琶、二胡的吳蕊真，後改名為吳韻真。吳韻真（1920.06-?），河北保定人，父親在冀察政府做事。兩人相識於 1939 年，江文也入獄期間她曾至臺灣同鄉會工作。〈冷齋小記〉充滿對江文也細微的印象描繪、夫妻書信與相處回憶，以及江文也學生、友人寫給吳韻真的書信。記述方式上，段落多以「某月某日」起筆，與江文也戰前少見的中文札記作品《作品餘燼》雷同，行文風格卻不相同。參見劉美蓮：《江文也傳：音樂與戰爭的迴旋》（臺北：印刻文學生活雜誌，2016 年），頁 255、297-309。

⁵³ 莊泗川，字貴嚴，臺灣嘉義人，畢業於上海大學中國文學系。日治時期曾著文檢討臺灣婦女社會運動問題，中日戰爭時任《武漢報》總編輯，戰後被以漢奸罪名逮捕，隨後處分不起訴，回臺後不再涉入政治與報界，一生從商。參見許雪姬訪問、黃美滋記錄：〈百年憶往——莊泗川先生訪談記錄〉，《戒嚴時期政治案件專題研討會論文暨口述歷史記錄》（臺北：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2003 年），頁 162。

的確台灣人太可憐了，為著祖國外交的失敗，而被動的犧牲了國民的權利與自由，痛壓於日敵慘酷威迫之下，忍氣吞聲，挨著無邊無涯，無光明希望的亡國日子。驟然光復，重歸祖國，也是他們「忍耐」的代價！

假如，祖國對於這個受苦的台灣，再沒有特別的理解與愛護時，我想這個「肯忍耐」，「能忍耐」的人，到了忍耐的苦痛絕端，也會自然的溢出一種反動的波沫來……。⁵⁴

犧牲權利與自由的臺灣人得以重歸祖國是用「忍耐」換取的代價，但對臺灣不甚瞭解的祖國卻未予理解，等同拋卻了對當初決定割讓臺灣的補償。因此，引文預示臺灣人對於「祖國」終將產生反動。而故事現實內的妻子仍在等待丈夫的最終判決，意即現實中仍等待國民政府對臺灣人確切的處理態度。判決仍未確定，也顯現當時政府對於臺灣人的態度曖昧不明，戰後臺灣人漢奸的無罪開釋並未成為中國社會普遍定見。〈冷齋小記〉敘事者心理狀態顯然擺盪在歡喜光復的遺民，及身分遭政府懷疑的棄民之間，游移不安成為《新臺灣》旅京臺人的心情寫照。

《新臺灣》文本對中國的反動情緒，出自戰後初期臺灣知識分子對所秉持的文化價值——民主和自由，⁵⁵以及現實上擁護臺人權利卻未如預期之雙重失落。旅平同學會曾指出中日戰爭是象徵民主思想對戰帝國主義思想的勝利，⁵⁶不過戰後旅京臺人所遭受的歧視，加之臺灣所施行的行政長官公署特別行政體制，⁵⁷及戰後臺灣社會秩序、民生問題層出不窮，都讓戰前為了追求殖民體制外自由而旅居中國的臺人產生認知衝突。《新臺灣》啓蒙和解放的父系國族話語空間裡，文本情節

⁵⁴ 餘波：〈冷齋小記〉，《臺灣舊雜誌覆刻系列4《新臺灣》》，頁15。原出處為《新臺灣》第1卷第4期（1946年5月1日）。

⁵⁵ 崔末順：〈「重建台灣、建設新中國」之路：戰後初期刊物中「文化」和「交流」的意義〉，頁66。

⁵⁶ 編輯部：〈臺灣省旅平同學會成立總會記錄〉，《臺灣舊雜誌覆刻系列4《新臺灣》》，頁10。原出處為《新臺灣》第1卷第4期（1946年5月1日）。

⁵⁷ 行政長官公署具有軍政一元化、專制行政與委任立法性質的行政體制。參見黃英哲：《「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台灣文化重建（1945-1947）》，頁33。

多依據真實人物的經歷增添信度，故事中的女性則被召喚現身，成了男性啓蒙者的作用客體或政治符號，就國族認同議題以及臺灣人國民身分進行辯證與建構。性別體制由權力（父權體制）、生產（性別分工）、情感依附（慾望情感）三組結構所組成，呈現權力、階層和不平等的關係。⁵⁸此性別階層化的結構即是《新臺灣》話語操作的動態空間，尤其是女性特質的家庭角色分工、柔性溝通導向，以及社會結構弱勢位置之運用。探究《新臺灣》的男性作家擬仿女性現聲／現身的文本意義，另印證了戰後臺人父系中心式的認同建構特質，即私領域家庭的性別權力關係，相應於公領域社會的認同政治運作。兄弟、父親、丈夫等男性角色，即便未曾親身出現於故事中，也相當程度透過書信或人物回憶加以主導女性認同，文本裡的姊妹、女兒、妻子則沿襲傳統家庭倫理價值觀的孝女、順婦、賢妻、慈母等角色，擔負了負罪、被誤解、待救贖的悲情印象。

三篇小說所描寫的女性身分，可以判讀出分別是日治時期殖民地女性、與人發生婚外情並育有非婚生子女的女性、1945年後回歸中國的女性，其訴求亦對應至當下國民身分、漢奸審判及臺灣人產業處置辦法的政治問題，亦即《新臺灣》創刊動機。

四、結語：擬聲政治的性別操作

《新臺灣》創刊背景是在中國政府不對等的政治態度與措施之下，旅京臺灣人爲己身辯護所成立的言論空間。創刊主要目的是爲臺人之喉舌，以言論行動強烈反對政府當局之臺人措施，包括懲治北京臺奸問題、臺灣人產業處理辦法二者。⁵⁹《新臺灣》實際代表其所屬機關「臺灣省旅平同鄉會」的聲音，來稿者不分省籍，凡是臺灣相關議題概以接受。縱使即便是省籍並非臺灣人的來稿，也因經過雜誌編輯方針與發行人旅京臺人梁永祿的審視之下，而具相當程度的臺灣立場。

⁵⁸ 琳達·麥道威爾（Linda McDowell）著，徐苔玲、王志弘譯：《性別、認同與地方：女性主義地理學概說》，頁 25-26。

⁵⁹ 秦賢次：〈《新臺灣》導言〉，頁 7。

僅在北京發行四期的《新臺灣》，其焦點相對集中於臺人身分考辨與中國接管臺灣的問題。不論名為「父祖之國」或「慈母中國」，諸篇論述皆將臺人置入父系家族的民族主義隱喻，藉由對抗日本殖民政權的壓迫以形塑國族之內一致的認同，中國成為臺人精神追懷或情感連結的仰視對象。但過度強調民族歷史、抗日運動的民族精神與認識臺灣，反而凸顯臺灣、中國之間缺乏現實連結，而急於創發某種地理認識與國族圖景的論述營為。

日治時期以來處於非中非日身分雙重邊緣的臺灣人，面對戰後多變詭譎的中國時勢，交互作用下其結果即《新臺灣》的敘事普遍強調「父系家族比喻」，國家概念被類比為家族與家庭空間，並透過對於性別差異的摹寫，將傳統倫理關係中的他者女性吸納於國族想像的政治圖像之中，作為國族集體想像的守護論述。

「性別」向來是文本分析一個有用的研究角度，身分和性別觀念都是透過社會論述和日常活動而建構與維持，文本則為此論述建構的一面折射鏡。《新臺灣》的編輯群與作家群使用性別擬聲的敘事意義，其一為對外強調中國應對臺灣具有母親般之於子女的包容力，其二為內發以女性的聲音呈現訴求本身的柔性姿態，以及身分認同上作為被殖民者的無奈。這擬聲敘事背後依舊顯現「性別」為戰後初期國族敘事中所宰制、支配、操作的權力結構關係，呈現女性相對於男性的資源匱乏的不平等。「以家喻國」是文學書寫中常見的修辭策略，⁶⁰《新臺灣》的執筆者面對戰後家國秩序的重整、前殖民地的認同困境，無所依靠的心理狀態和亟欲正名的身分認同之多重焦慮，急切抓住了漢文化父系社會的家國文化想像，延續了傳統性別文化結構，根植於家庭的性別觀念一併參與敘事運作。

性別關係始終牽涉了壓迫與剝削的社會權力運作。⁶¹需留意的是，《新臺灣》的女性修辭初始表現了絕對的政治正確態度，但身分協商的行動卻持續在現實生活中遭遇質疑，因而逐漸展露出挫敗的情緒和批判的語言。例如創刊號的中國以慈祥母親形象降臨，至第四期〈我的家鄉（三）〉的中國卻被描述為封建落後的

⁶⁰ 梅家玲：《性別，還是家國？五〇與八、九〇年代臺灣小說論》（臺北：麥田出版社，2002年），頁6。

⁶¹ 黃淑玲、游美惠主編：《性別向度與臺灣社會》，頁75。

失職母親，透過前後對比，男性執筆者同以（擬）女身／女聲出現於文本中，一則表現了戰後臺人處境就如同日治時期女性遭受殖民政府和社會結構雙重壓迫的狀態，亟待中國認可重回祖國懷抱；一則印證身分認同經由言語論述的重複操演而持續生產、累積、變化；權力是各種政治、社會與意識形態競逐與協商的結果，因此可能產生改變。《新臺灣》性別話語操作的隙縫間，所謂父系國族認同的性別權力結構亦有抗拒再生產的可能。例如以女性為敘事第一人稱的〈冷齋小記〉，援引真實人物經歷和判決史實，從丈夫被捕的無助妻子、母親傾力控訴祖國對臺灣人的不公。若是執筆者為臺人漢奸案受害者的女性眷屬，則更添性別之於國族身分辯證的能動性。

戰前旅居中國的臺灣知識分子的認同結構，並存著「祖國意識」與「棄民意識」的二重性。⁶²吳叡人說明這種中國認同的二重性，根源自臺灣人身為「弱小民族」的自覺。⁶³日治時期追求中國反殖民力量的臺灣知識分子，便以「弱小民族」共同陣線之意識觀看、行旅中國，甚至親赴中國活動，是故面對光復，臺灣人自然將戰前抗日反殖民價值嫁接至對祖國中國的認同。「祖國」對日治時代臺灣知識分子而言是一種文化與記憶的歷史共業，這共業以對漢文化的認同為基礎，「集體記憶」則由當代經驗（尤其是日本人的殖民與壓迫）所建構的。⁶⁴這種漢文化、殖民歷史的論述成為《新臺灣》替臺人國民身分辯護的論據之一，但也流露「祖國」（中國）既非故鄉，也不是生長的土地，而蘊含了延伸自對抗日本殖民統治（反抗帝國主義運動）之共同價值下形成的一種運動概念。所以當 1945 年臺灣治權重劃後臺灣人的民主要求遭到漠視，歷史現實與日治以來的精神信念產生斷裂時，其支撐中國認同價值的支柱即搖搖欲墜。

⁶² 近藤正己著，林詩庭譯：《總力戰與臺灣：日本殖民地的崩潰》（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 年），頁 546-547。

⁶³ 吳叡人：〈祖國的辯證——廖文奎（1905-1952）臺灣民族主義思想初探〉，《存在交涉：日治時期的臺灣哲學》（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6 年），頁 229。

⁶⁴ 黃俊傑：《臺灣意識與臺灣文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6 年 11 月），頁 95-97。

徵引書目

一、專書

- 卞鳳奎：《日治時期臺灣籍民在海外活動之研究（1895-1945）》（臺北：樂學書局，2006年7月）。
- 王德威：《後遺民寫作》（臺北：麥田出版社，2008年）。
- 北京市臺灣同胞聯誼會編：《臺灣會館與同鄉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
- 任金斯（Richard Jenkins）著，王志弘、許妍飛譯：《社會認同》（臺北：巨流圖書出版，2006年）。
- 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編：《臺灣舊雜誌覆刻系列4《新臺灣》》（臺北：傳文文化，1998年）。
- 吳禮權：《中國現代修辭學通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8年）。
- 沈信宏：《洪炎秋的東亞流動與文化軌跡》（臺北：秀威資訊，2016年）。
- 周新富：《家庭教育學——社會學取向》（臺北：五南書局，2006年）。
- 近藤正己著，林詩庭譯：《總力戰與臺灣：日本殖民地的崩潰》（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年）。
- 張泉：《淪陷時期北京文學八年》（北京：中國和平出版社，1994年）。
- 梅家玲：《性別，還是家國？五〇與八、九〇年代臺灣小說論》（臺北：麥田出版社，2002年）。
- 許雪姬主編：《戒嚴時期政治案件專題研討會論文暨口述歷史記錄》（臺北：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2003年）。
- 陳芳明等編：《張深切全集2 里程碑》（臺北：文經出版社，1998年）。
- 陳芳明等編：《張深切全集卷11 北京日記·書信·雜錄》（臺北：文經出版社，1998年）。
- 曾健民主編：《復現的星圖》（臺北：人間出版社，2000年）。
- 琳達·麥道威爾（Linda McDowell）著，徐苔玲、王志弘譯：《性別、認同與地方：女性主義地理學概說》（臺北：群學出版社，2006年）。

- 黃俊傑：《臺灣意識與臺灣文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6年）。
- 黃英哲：《「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台灣文化重建（1945-1947）》（臺北：麥田出版社，2007年）。
- 黃淑玲、游美惠主編：《性別向度與臺灣社會》（臺北：巨流圖書，2012年）。
- 楊肇嘉：《楊肇嘉回憶錄》（臺北：三民書局，1970年）。
- 劉美蓮：《江文也傳：音樂與戰爭的迴旋》（臺北：印刻文學生活雜誌，2016年）。

二、期刊論文

- 王雅玄、蔣淑如：〈書寫歷史——教科書中性別化國族主義的批判分析〉，《教科書研究》第10卷第1期（2017年4月），頁101-136。
- 宋冬陽：〈朝向許願中的黎明——試論吳濁流作品中的「中國經驗」〉，《文學界》第10期（1984年5月），頁127-146。
- 崔末順：〈「重建台灣、建設新中國」之路：戰後初期刊物中「文化」和「交流」的意義〉，《臺灣文學研究學報》第21期（2015年10月），頁39-69。
- 張良澤：〈鍾理和作品中的日本經驗與祖國經驗〉，《中外文學》第2卷第11期（1974年4月），頁33-57。（DOI：10.6637/CWLQ.1974.2(11).32-57）
- 張泉：〈張深切移居北京的背景及其「文化救國」實踐——抗戰時期居京臺籍文化人研究之一〉，《臺灣研究集刊》第92期（2006年6月），頁80-88。
- 張惠珍：〈紀實與虛構：吳濁流、鍾理和的中國之旅與原鄉認同〉，《臺北大學中文學報》第3期（2007年9月），頁29-66。（DOI：10.29766/JCLLNTU.200709.0002）
- 許雪姬：〈1937年至1947年在北京的臺灣人〉，《長庚人文社會學報》第1卷第1期（2008年4月），頁33-84。（DOI：10.30114/CGJHSS.200804.0003）
- 黃麗月：〈「中國作家」／「臺灣作家」：夢的兩端——解讀鍾理和返臺前後的作品〉，《漢學研究集刊》第4期（2007年6月），頁111-138。（DOI：10.7045/YJCS.200706.0111）
- 楊婉瑩：〈民族主義的父系家／族譜的繁衍與衰落——台灣個案的經驗〉，《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21卷第2期（2009年6月），頁291-323。（DOI：

10.6350/JSSP.200906.0291)

蘇瑤崇：〈「終戰」到「光復」期間台灣政治與社會變化〉，《國史館學術集刊》第 13 期（2007 年 9 月），頁 45-87。（DOI：10.7058/BAH.200709.0045）

三、論文集論文

吳叡人：〈祖國的辯證——廖文奎（1905-1952）臺灣民族主義思想初探〉，《存在與交涉：日治時期的臺灣哲學》（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6 年），頁 229。

張泉：〈北京淪陷期的臺灣文人群落：以共時的殖民體制差異和歷史的殖民演化型態為切入點〉，《跨國的殖民記憶與冷戰經驗：臺灣文學的比較文學研究》（新竹：國立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2011 年），頁 331-362。

廖咸浩：〈在解構與解體之間徘徊——臺灣現代小說中「中國身分」的轉變〉，《後殖民理論與文化認同》（臺北：麥田出版社，2003 年），頁 193-206。

四、學位論文

王申：《淪陷時期旅平臺籍文化人的文化活動與身分表述》（北京：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博士論文，2010 年）。

吳欣樺：《硝煙與白衣：日治末期的台灣從軍看護婦》（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 年）。

五、研究報告

蘇瑤崇：〈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與台灣總督府體制之比較研究〉（臺北：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基金會委託研究，2004 年）。

六、引用報紙

汪毅夫：〈愛國愛鄉兩岸情——讀梁永祿先生家藏文獻〉，《團結報》，第 6 版，2010 年 4 月 1 日。

Whose voices are heard?

A Discussion on the Feminine Rhetoric of *New Taiwan* in the Early Postwar Period

Lo, Shih-Yun

Project Assistant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Chihle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bstract

In the historical narrative, 1945 was the year which the free world defeated militarism. For Taiwan, it was the historical stage of the “nationalization” of the multi-residents in the territory after the disintegration of Japanese colonial rule; however, the process of national integration was broke in the early postwar period. The gender relationship has always been referred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on of the national identity. Thus, this paper combines this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aiwan in the early postwar period and the gender roles in the identity construction as the researching point. Exploring the cultural discourse and imagining nationhood of Taiwanese intellectuals who lived in Beijing in the early postwar period by discussing the feminine rhetoric in the national discourse of the magazine *New Taiwan* (新臺灣). This paper first summarizes the origin and content issues of *New Taiwan*, which was published in Beijing in 1946, to explai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 Taiwanese publications in the early postwar period. Secondl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peaking gesture and identity thinking about the Native China(原鄉中國) and Hometown Taiwan(故鄉臺灣) of the former colonial Taiwanese

intellectuals who lived in China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by discussing the gender metaphor and feminine rhetoric of *New Taiwan*. This paper intends to present the political operation of Taiwanese identity and gender discourse in the early postwar period. The emotional narrative of the female voice is showing the Taiwanese consciousness of the Other and the pursuit of subjectivity.

Keywords: the Early Postwar Period, *New Taiwan*, Feminine Rhetoric, Imagining Nationhood, Lan Ming-gu